

诗经宗教文化 探微

樊树云 著



SHIJINGZONGJIAOWENHUATANWEI

南開大學出版社

诗经宗教文化探微

樊树云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宗教文化探微 / 樊树云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3

ISBN 7-310-01508-8

I. 诗... II. 樊... III. 诗经—文学研究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851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电话:(022)23508542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印数 1—1000

定价 30.00 元

序

夏传才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现代诗经学，是对两千多年传统诗经学的继承和革新，完成了质的飞跃和规模空前的大发展。

我们这一代学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师们薪火的传承者，接过前辈大师们高扬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继承了传统诗经学丰富的研究遗产，并以新的观念进行检验，努力开拓和创新。现代诗经学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经过几代人的研究，从总体来看，随着时代的进步，按照认识发展的规律，我们现在对《诗经》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传统的学术。

先辈大师们给我们留下一条宝贵的经验：创新和开放。学术的生命就是创新，不能总为前人的辉煌而迷醉，在既有的成说上打转转，原地踏步；如果那样，学术毫无生气，就会停滞、衰落和死亡。创新，就要超越，检验原有的成说乃至定论，打破传统的观念和模式，破旧立新，并向未知的领域进军。创新，就要开放，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接受科学的新观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发掘和利用新的研究资料。“五四”的先驱者都积极地

面向世界,学习新思想,借鉴新方法,倡导“拿来主义”,形成一代学风,使中国学术焕然一新。

中国现代诗经学不足百年的历史,是不断接受各种新观念,借鉴各种新方法论,不断破旧立新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历史。早在1907年,鲁迅即热情地赞扬欧洲诗歌文学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批判传统的封建诗教,他是用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评论《诗经》的一个人。胡适派引进的民主主义、学术自由、实证主义方法和历史语言考证方法,古史辨派的疑古求实、辨伪辑佚,都对现代诗经学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早在1929年,郭沫若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诗经》研究体系。对《诗经》进行人类文化学、宗教文化学以及神话学、民俗文化学研究,在三十年代也已经开始,闻一多、郭沫若都是卓有成效的先行者。由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战争环境缺乏学术发展的条件;五十至七十年代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庸俗社会学的横行,万马齐喑;直到八十年代,各种文化学的研究才得以蓬勃发展,相继出现了一批著作。如《兴的源起》(赵沛霖)、《诗经的文化阐释》(叶舒宪)、《诗经民俗文化论》(周蒙)、《诗经胜境及其文化品格》(许志刚)、《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李湘)、《诗经与中国文化》(廖群)、《诗经的文化精神》(李山)、《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品格》(王洲明)等等,樊树云新著《诗经宗教文化探微》,是这类研究著作中的新成果。

《诗经》中的歌诗产生于上古时代,其中一部分并保留着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存,某些词语和意象,可能具有原始的、宗教的、民俗的象征或隐喻的意义。破解这些隐秘的内涵,可以正确和深入理解诗篇的本义,同时也大大拓展了诗经学领域。

不过,追寻遥远古代的文化遗迹,破解词语背后的隐秘之谜,确非易事,前辈大师们也常常难免不能中的。在学术研究中,失误总是难免的。我们既然允许自然科学实验可以有一千次、一万次失败,而且以“失败是成功之母”来鼓励;那么,为什么不能容忍人文科学研究的失误,反而备加责难呢?

我这样说,决不是同意二十年前那种梦呓似的“臆语”、异想天开的“新解”满天飞。什么《月出》是杀害奴隶,《北风》是号召奴隶逃亡,这类解析不过是迎合或谄媚权贵;近十年,什么“雌鸠是天鹅”,“有郤是犹太”,不过是故作惊人之鸣,哗众取宠。我们可以宽容,却不赞同这种学风。我们提倡学术规范,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实”是具体的丰富的材料,“求”是科学的论证,“是”是得出的结论。能够这样做,则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就可能“虽不中亦不远矣”;即使材料有误,推论有疏,或有片面性的失误,也是可以谅解的。如果只是灵机一动,故作惊人之鸣,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那就不可取了。

樊树云同志的这部新著,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宗教文化学的观念和方法,追溯中华古文化的人文特征,研究了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神话、巫觋和原始歌舞,进而把《诗经》中的一些篇章放在宗教、民俗的背景上进行审视,并试图对几篇诗作出新解。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尽管一些见解尚待商榷,他能够开阔视野,不囿于成说,勇于创新,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樊树云同志长期在政法部门担任中层领导,工作是很辛苦的,完全是在业余来研究《诗经》,几十年乐此而不疲。八十年代出版过一部《诗经全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经常在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现在又推出这部十余万字的研究专

著,不是为了评职称、晋级,不是为了长工资、拿稿费,他三十年坚持《诗经》研究,完全出于对《诗经》这部中华元典的热爱,对诗经学研究的执著,因此,翻读这部十余万字的原稿,我估算不出这要用他多少心血,多少不眠的夜晚。我真想握住他的手,亲切地唤他一声同志!

2000年3月

序

赵沛霖

面对“三百篇”这样具有深广的宗教民俗背景的上古作品，一般的训诂和分析往往会显得捉襟见肘。对唐诗、宋词和元明清诗文适用的研究方法未必适合于《诗经》。清代学者向称治学严谨，立意朴诚，其文字、训诂、考证细密精审，不容丝毫疑隙，他们对“三百篇”某些草木鱼虫的训解和考证，动辄数百千言，但却难得确解，原因在于有些物象，如某些鱼、鸟和草木在诗中除了它们的自然形象之外，还带有一定的宗教观念意义。据闻一多先生考证，鸟在诗中具有图腾的性质，鱼则是匹偶、情爱和婚媾的象征。这些意义与其外在形象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对它们的无论怎样详尽精审的考证，也不可能得其真髓。而运用文化人类学和宗教文化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它们，问题会立即迎刃而解。

《诗经》研究史的发展雄辩地说明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自古至今，《诗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先后经历了以每篇作品为研究单位，以章句训释和解题为中心任务的注释型研究；以每篇或某类作品为

研究单位,以分析和提示作品思想内容、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为中心任务的分析型研究;以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及其与各种意识形态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为中心任务的综合型研究。综合型研究是八十年代兴盛起来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一般说来,它要求把作品放在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既考虑政治历史环境,也考虑其他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文学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网络关系中来加以把握,因而这种研究必然是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交叉研究,必然涉及到多学科,如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美学等等。

对于“三百篇”的综合型研究,宗教学(特别是其分支宗教文化学)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主要决定于“三百篇”与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不说那赞美神灵、祈福禳灾的大量祭祀诗,不说那祈年报啬、祭祀方社的农事诗,也不说那屡见于诗中颇具神秘色彩的感天、瑞兆和梦占,即使是那些洋溢着人间情趣的情诗,风俗诗和狩猎诗,也有不少具有遥远的宗教民俗文化背景。要真正理解这些作品,离开宗教文化学的阐释是不可能的。“三百篇”虽说是作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七世纪,但某些作品的文化背景和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却远早于此,有些可以一直上溯到遥远的原始时代。在原始时代,原始宗教在全部意识形态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文学艺术不可能脱离它们支配和影响。因此,从宗教文化学的视角来审视“三百篇”必然会有新的发现。本书的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而著此书。

当然,从这个角度把握作品,由于年代久远,背景和环境茫然难考,同时由于涉及面十分广泛,问题复杂障碍多,难度

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在这个领域里要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是非常困难的。本书中的一些结论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嘉的。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作者自大学毕业之后,几十年来一直作行政工作,研究工作只能利用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术研究受到冷遇,作者却不为时俗所囿,这不仅说明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经》学的巨大学术魅力。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



作者简介

樊树云，中国诗经学会会员。
1942年生于河北沧州一书香世家；
1962年就学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雅嗜《诗经》攻研甚力。毕业后，
又于军旅政务之余，潜心钻习，
遂于1982年著成《诗经全译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之后，仍乐此不疲，笔耕不辍，曾
发表研究论文多篇。今又成此《诗
经宗教文化探微》。为此，作者咏
志：

矢志治诗卅余年
皓首穷经莫等闲
攀龙折桂非吾意
漓江顺风好行船

目 录

序	夏传才(1)
序	赵沛霖(5)

总论

引论	(3)
第一章 中华文化的发端	(7)
第二章 中华古文化的人文特征	(15)
第三章 中华古文化——原始歌、乐、舞	(27)
第四章 中华古文化的传承——《诗经》	(38)

分论

第五章 《诗经》与原始宗教	(49)
第六章 《诗经》与图腾崇拜	(59)
第七章 《诗经》中的神和神话	(68)
第八章 《诗经》中的前兆迷信	(82)
第九章 《诗经》中祭诗和祭祀活动	(88)
第十章 芣苢与夏图腾	(94)
第十一章 漫话睢鸠	(101)

第十二章	《诗经·陈风》巫诗说·····	(107)
第十三章	《驹虞》——原始狩猎巫歌·····	(113)
第十四章	《云汉》——周人乞雨巫歌·····	(119)
第十五章	解析《诗经·魏风·硕鼠》·····	(126)
第十六章	略论《诗经》中“门”的宗教意义·····	(134)
第十七章	《诗经》玉文化的宗教内涵·····	(141)
第十八章	采摭诗与宗教文化·····	(157)
第十九章	军旗原为图腾旗·····	(164)
第二十章	《诗经》与《圣经》之比较·····	(170)
第二十一章	从大文化视角辨《国风》之“风”·····	(180)
附录：一	在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论诗经的宗教文化性质·····	(189)
二	在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194)
参考文献	·····	(196)
后记	·····	(198)

总 论

引 论

《诗经》，一部和《圣经》一样放射着灿烂光芒的经典，为世人捧读了数千年。

《诗经》(汉之先称《诗》或“诗三百”)自孔子始，便成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①，“捍圣卫道”的“诗”教人学。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犯而不校，温柔敦厚的教科书。它是封建道学家的侍婢，经学家的奴仆，是整个封建社会规范统治秩序与道德伦理的“宝典”。然而，这并不是《诗经》的本义。

《圣经》(指《旧约全书》)初为希伯来人古存之文献，经祭司整理编纂为犹太教教义。后为基督教所接受，成为基督教信徒的神学信条。神学家把经文中所描写的那些本属于感性世界的事物抽象化，赋予种种象征意义，使之变成了理念世界，成为被神父们打扮得已不是朴实无华的贵族小姑娘。应该说，这些附会解说也不是《圣经》的原义。比如《圣经·旧约·雅歌》，按照传说，是撒罗满王的作品。但从16世纪以后，在非天

^① 《论语·阳货》。

主教的学者中,主张《雅歌》的纯自然解说,他们将《雅歌》与其它古代民族(如埃及、阿拉伯、希腊、印度等)的恋歌相比较,认为《雅歌》不外是歌颂男女爱情的诗歌。“《雅歌》从头到尾是恋歌,没有一点宗教的思想和感觉”。^①

可是,上古乃至远古先民的生活又怎能脱离宗教?诗是宗教诗,歌是宗教歌,他们的生活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和犹太人的《圣经·旧约》相近,《诗经》是“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②,既是远古先民的民俗遗风,又是从事巫觋职业的一切神职人员所吟唱的巫歌(即所谓寺人之言)一类的宗教文化,是夏、商时代的“神本文化”或由“神本文化”向周代“人本文化”的过渡。

我们研究古代原始宗教,往往苦于无可凭借之资料,常埋怨说“古籍记载很少,有待考古新发现”等等。实际上,《诗经》本身就是研究中国原始宗教的一本可靠资料。比如《诗经》中有图腾崇拜,包括对动物(如雉、鸛、鸟、麒麟、龙、凤、鱼、燕子等)、植物(芣苢、桃、蕤等)的自然崇拜,并由自然崇拜(多神教)向上帝崇拜(一神教)的过渡;有祖先崇拜,占卜,祭祀等古风民俗、宗教仪式;也有巫觋祝咒,有的诗本身就是一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巫歌(如《召南·驺虞》)。据史料记载,夏、商、周三代特别是殷商、禹夏国人均信奉巫教。《礼记·表记》载:“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夏朝有像巫彭、夔这样的专职巫官;商代,祭祀是最大的礼,“先王之礼,莫

① 朱维之:《文艺宗教论集》,青年协会书局,1951年版,第102页。

②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